

PETER GAY

[美]彼得·盖伊◎著 赵勇◎译 舒小昀◎校

感官的教育 (下)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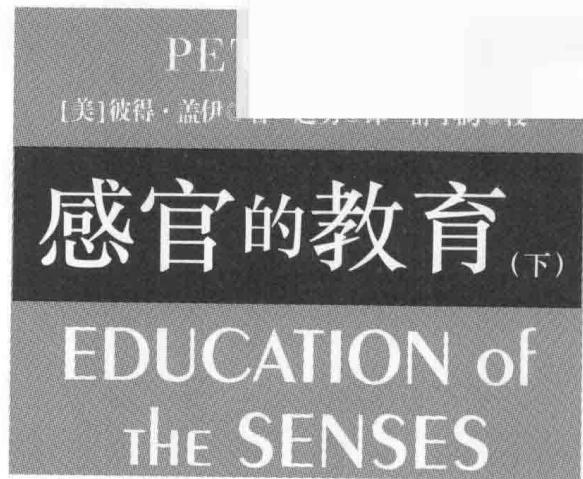
布尔乔亚经验
从维多利亚
到弗洛伊德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文
景

Horizon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布尔乔亚经验
从维多利亚
到弗洛伊德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官的教育 / (美) 盖伊 (Gay, P.) 著; 赵勇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布尔乔亚经验: 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

书名原文: Education of the sense

ISBN 978 - 7 - 208 - 12204 - 8

I. ①感… II. ①盖… ②赵… III. ①社会生活—研

究—西方国家—18世纪~19世纪 IV. ①D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9404号

责任编辑 袁晓琳
装帧设计 黄炜鹏
美术编辑 赵晓笛



感官的教育

[美] 彼得·盖伊 著

赵勇 译 舒小昀 校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4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43.5
插 页 8
字 数 608,000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 - 7 - 208 - 12204 - 8 / K · 2202
定 价 108.00元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1: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by Peter Gay

Copyright © 1985 by Peter Gay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4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简体字中文版，此版本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第四章 饱学的无知

278

1. 虚假的纯真年代

人类的无知经历了几个阶段。当他们呱呱落地、降生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在精神和身体上都被赋予了各种不同于他人的禀赋；但所有这些天赋都只是各种潜在的可能性，还有待各种经历使之成为现实。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知识就纷至沓来，并在他们的心理上留下了烙印。他们在婴儿期的最初际遇经验就是各种广泛的略带尝试的性教育；母亲的乳房、她温暖的拥抱、她抚慰的话语、她可能有时莫名其妙地不在身边——这让他们感到恐惧——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强制和权威的，有时能为成年后的性爱经历提供严苛的训练和准备。

这些强制和权威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当儿童开始区分内在的冲动和外界的印象、建立自我与世界的边界，在与父母的相互关系中他们并不能感觉到快乐，有时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其实他们这时候是在积累经验的原始素材，正是通过这些原始素材，他们才能建构自己的性爱议题。接下来，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阶段——那种痛苦的家庭三角关系，儿童的情爱史上第一次经历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危机，对女孩和男孩来说都同样具有决定性。但是这些发展过程中早期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阶段，尽管被永远保存了下来，但是几乎全部被遗忘了。在经历了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儿童开始压抑他们习得的经验。这些强烈的遗忘行为似乎可以有很好的解释：小男孩很快就会不愿意提起对他曾经珍爱的阴茎公开或虚构的威胁，小女孩宁愿否认她在发现没有阴茎时所感到的悲伤。

但这并不意味着眼不见，心不念。当不可抗拒的遗忘过程开始时，
 279 儿童对性的探求，还有他们往往是略显古怪的性观念——当然可能还有他们的
 性体验，所有这些并未彻底消失，只是不可利用的体验罢了。在以后的
 岁月里，这些经验还会再次出现，只是被精心地掩饰或装扮，以其他各种形
 式出现：性爱的储存经历、特别的品味、扭曲的记忆，往往还有神经质的症
 状。从五六岁到性成熟的初始阶段——这是一段长时间的性潜伏期，经历
 这个阶段之后，就是人类性教育特有的第二个阶段，即青少年时期。这个
 阶段的性意识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在这个阶段一种独特的生理欲求迫切
 地得到认可。青少年的性爱试验和困惑是婴儿期经历某种形式上的重复。
 但是遗忘机制再次发生作用，尽管这次没有上一阶段那么彻底，但是还是
 那么具有侵略性，似乎要消耗年轻男女所有可利用的性知识储备。有人可
 能会怀疑这种遗忘是否真的具有决定意义；年轻人自己经历的或从朋友那
 得来的对性爱过程的解释毕竟大部分都是不精确的，而对他们最早期的经
 验回顾甚至是荒诞无稽的。¹但是从这个方面而言，在幼儿期和青春期对
 性的压抑并不是有所取舍的；没有经验的新郎和新娘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几
 乎忘记了他们实际上学习到的正确知识，也忘记了他们急切地想要创造的
 观念。天真与无知一旦丧失，就永远不能再挽回了，但是在19世纪那些体
 面的青年男女总是以某种无知状态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对此我称之为虚假
 的纯真。

这种纯真的假象必然部分地来自人类独特的性心理发展进程，而这是
 19世纪资产阶级与人类整体历史上共有的。人类潜在的乱伦愿望，既让人
 感到兴奋又让人感到可怕；人类就是在这种分裂的状态中步入了成年，因此
 存在大量的压抑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压抑有时对人类是有益的：它们

¹ 虽然很难找到关于去势的真正威胁的文献记载，但是精神分析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例子。“小汉斯”(Little Hans)是弗洛伊德在1908年治疗过的一个5岁小男孩，几乎完全处于失神状态，曾经遭受过母亲的直接警告：“在3岁半的时候，他母亲看见他用手拿着阴茎。她就威胁他：‘如果你那么做，我就把你送到A医生那里；他会把你用来撒尿的小鸡鸡切掉。’”——小汉斯是这么形容他的阴茎的。“‘然后你用什么来撒尿啊？’”小汉斯显然被吓着了：“‘用我的屁屁撒尿。’”“Analyse der Phobie eines fünfjährigen Knaben [Der kleine Hans]”(1909), *St. A.*, VIII, p.15;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 [Little Hans],” *S. E.*, X, pp.7-8. 弗洛伊德的其他病人，包括著名的“鼠人”(Rat Man)也陈述了同样的威胁，但是小汉斯的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的父母曾经公开支持心理分析理论，也是思想开明的追随者，但仍然不能放弃传统的威胁。

保护了人类应对各种亲密关系的能力，也保障人类的心理健康。但是有些压抑可能得到释放，而最令人满足的方式就是在婚姻的温床上。1884年，苏格兰杰出的妇产科医生马修斯·邓肯 (J. Matthews Duncan) 指出，“快乐，在新婚之夜经常是缺失的，而且这种状态一直在婚姻中得以缓慢地延续”。¹15年之后，德国的专科医生弗利德里希·西伯特 (Friedrich Siebert) 对同样所谓快乐的现象作出了评价：“必须指出，如果不告诉一个女孩结婚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就让她们结婚，这是完全不公平的——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他又补充说——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然而，女人大多数不会因为那个原因离开她们的丈夫”；她们也不会尖叫以寻求帮助。“她们知道怎样调整自己——即使没有那种快乐，她们也会努力发现快乐的一面。但是有几个年岁稍大的女士告诉我，她们回过头看她们的新婚之夜时，总是感到恐惧，而且很后悔。”²但是这种恐惧是可以治疗的——当然是在某种情况之下。

能够兴奋地享受性满足——这种能力的出现并非仅仅只是新观念的开花结果，它也是对一种被弃绝的知识、一种记忆的解放。这有助于解释我一直坚持的观点：19世纪中产阶级的性幸福婚姻。在童年的激情中找到了值得全身心投入的成年目标之后，还有敏感配偶的支持，他们终于品尝到了那种滋味——当然，假设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损害身体的性痛苦。

然而这种后期的教育，或者说是感官的再教育有时候注定要失败的，因为19世纪体面的资产阶级常常为这种教育故意设置蒙昧的障碍，而且蓄意破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那些能够呼风唤雨的代言人不遗余力地让年轻人沉溺于无知的状态之中。许多医生、牧师、教师——由医生定下了基调，他们无视年轻人的性事实，捏造或者夸大性沉迷对心理和生理健康的威胁，这种恐吓使公众迷惑、畏惧，而他们也全然忘记了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应当为公众服务的。每当应该由他们来向公众传授关于性的知识并影响公众的性态度时，这些饱学的专家们却步履蹒跚，远远落后于当时那些理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大众；这些专家们传播的是蒙昧与无知，而不

1 *On Sterility in Women* (1884), p. 94. 参见本书第147页。

2 Siebert, *Sexuelle Moral und Sexuelle Hygiene* (1901), p.iii.

是光明与知识。但是,正如我将要能看到的那样,这些专家们也完全深陷于他们所处的文化体系之中,是他们所处文化的代言人。

这个时代的天真与无知并非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策略;它只是一种无计划的、具有高度适应特性的防御行为。作为大律师、诗人、让工人阶级妇女一见钟情的理想情人,蒙比 (A. J. Munby) 曾经说过,“那种对邪恶的无知,正是人们期望在妇女身上见到的”,¹而这个时代的文化风格也助长这种无知。对隐私的狂热、羞怯,在公共场合对身体的活动都不敢直呼其名——更遑论性关系了。所有这些都只是这种文化风格中最引人注目的表征,但也是最令人难忘的表征——我称之为:饱学的无知。这种无知表现人们无意识的渴望,是非正式传授的,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促成的。在这个资产阶级世纪,被压抑的因素比它所有的知识还多。

人们在谈论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时,在广为流传的传统智慧中,基本的因素就是那些耸人听闻的虚构故事:双唇紧闭的、单方面的、可悲的家庭性爱,或者是那些富有教养的年轻男女对性爱的方方面面都一无所知。有很多故事被指责为流言传闻,或者是毫无根据的一概而论。维多利亚女王,尽管在她当时的盛名之下,也常常被当做笑柄;说她绘画甚至购买男性的裸体画像,并把这样的图画作为礼物,赠送给她钟爱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²但是,这些故事有的是真的,它们被精神病专家当作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或是禁书中广为流传的丑闻,或是各种自传中心酸的真情流露。鲁琴斯夫人 (Lady Lutyens) 在回忆 19 世纪 80 年代初——当她还是艾米莉·里顿 (Emily Lytton) 的时候,写道:“我是一个好奇的小孩,特别是对性方面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想到过,向我母亲问那方面的问题。然而,我缠着我家的仆人问这些问题,我装作自己知道很多的样子,以便她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和我交谈。我和一个堂姐约定,找出所有我们能找到的,并告诉彼此各自的发现。”很显然,她的仆人和堂姐都未能给她提供她想要得到的

1 Diary, February 1, 1859, Derek Hudson, *Munby: Man of Two Worlds* (1972), p.19.

2 这个观点来自穆尔勒德。参见 Kathryn Moore Heleniak, *William Mulready* (1980), p.158; 裸体插图在第 154 页。

生理和心理上的信息；她后来发现，当她最需要保护的时候，那些当然也不能为她提供保护。1893年在她18岁的时候，她爱上了威尔弗雷德·斯卡汶·布兰特 (Wilfrid Scawen Blunt) ——那个著名的冒险家，但也是放荡的好色之徒，她认为“那是我遇见的最帅的男人，而且我认为也是身体上最吸引人的”，尽管（或者准确地说是因为）他的年龄是她的三倍。布兰特当时53岁，向她大献殷勤、试图诱骗她和他上床，但没有成功。

艾米莉·里顿足够聪明，她能够分辨出使她陷入这场错误恋爱的根源，以及这场恋爱的风险性。她责备那些礼貌的回避，还有那些无助的沉默，因为这些不能教她如何应对性诱惑。她在给知己的信中写道，“我们之后的经历明显地告诉我，那些用来保护妇女远离堕落传统的行为是愚蠢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世界上近一半不道德行为和悲惨境遇都是一种独特的强烈欲望导致的。出于仁爱的目的，这种欲望被植入男人体内，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且除了上千种不断发生的迹象，或者不只是迹象之外，还有这个内置的活跃因素，所以我们假设是这种可恶的教育缺乏助长了天真无知的状态。”她愤怒地问道：“在这样一个几乎不存在的假想的保护圈里，会有什么样的安全？而且当人们继续坚持这种虚假的保护，或者是完全相信这种保护时，有点近乎愚蠢。”¹关于这种强烈的性欲，或者说是“内置的活跃因素”，在青少年身上发出迫切要求，我能想起的像这样精确、详细的例子并不多。接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带着自己的自尊和纯洁的童贞，艾米莉·里顿逃离了布兰特的引诱。在1897年，在她最终从重大的感情纠葛中解放出来之后，她嫁给了颇有前途的建筑师艾德温·鲁琴斯 (Edwin Lutyens)。她克服了布兰特给她留下的阴影，但是她仍然坚信，如果她知道得越多一些，她遭受的痛苦就会越少。

事实上，她确实遭受了很多痛苦。她的婚姻经历了所有的风雨变迁之后，最后成功地落幕了。像她1929年对她丈夫说的那样：“32年啦！难道不愉快吗？我们过得多么幸福啊，尽管经历了很多风雨。”这些风风雨雨包括她拒绝了她丈夫很多年，也包括艾德温·鲁琴斯很长时间的婚外恋。就

¹ A Blessed Girl: *Memories of a Victorian Girlhood, 1887-1896* (1953), p.10; Emily Lytton to the Rev. Whitwell Elwin, September 2, 3, 1893, ibid., pp.228-229.

像艾米莉·鲁琴斯几年后给她丈夫所写的，她仍然记着她的蜜月期，“是一场噩梦，有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失望的记忆”。一场更可怕的噩梦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信仰神智论 (Theosophy) 多年之后，而且如此的虔诚以至于在结婚17年且身为3个孩子的母亲之后，她完全拒绝任何肉体上的关系，这很显然不是因为艾米莉·鲁琴斯性冷淡，而准确地说是因为她性欲强烈。她告诉她的丈夫，“你要记住，我嫁给了你，爱你，而且在肉体上需要你就像你需要我一样多。我不是一时兴起责备你婚后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你自私，不为我着想，而且我也很傻”。艾德温·鲁琴斯像他的妻子一样是毫无准备走入婚姻的；他非常急切而且性需求很多，显然他在没有满足他的妻子之前就很快射精，并且离开他的妻子。就像她坦诚地对她的女儿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夜晚，我都是未能满足的，充满怨气的”。她想要分享他的想法、他的见闻和他的工作。当她可怜地表达她想要在思想上靠近的愿望时，她甚至用身体作生动的比喻，以唤起他对她已经受挫的性欲的注意：“不是我不爱你——我如此地爱你，所以我想要更多地拥有你——不仅是你的身体，还有你的灵魂，你的想法，想要有某种很大的东西我能够抓住它，并且和你一起分享。”那个很大的能抓住的东西非常像他的阴茎：“当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尝试着让我靠近你——”她在同一封信中还写道，“要有耐心、更温柔——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我不是难以取悦的——只要你能把我和你的生活看成同等重要。”¹他祈求她原谅他，要她对他有耐心，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就是她的生活圈子，他没有确切发现他怎么和她一起分享，怎么满足她。这两个人都为彼此投入了很多精力；随着他们一起走过的岁月的流逝，也因为他们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他们更加爱彼此。但是对性的无知，如果导致的不是悲剧，至少也是带来麻烦的诱因，他们共同的无知使这个诱因变得更加紧迫。

从其他像艾米莉·鲁琴斯和她丈夫一样无知的夫妻的婚姻经历来判断，她对她那个年代的中产阶级女孩境遇的描述既不是古怪的，也不是主

¹ Mary Lutyens, *Edwin Lutyens* (1980), pp.242-296, 297, 77-78. “他们都有强烈的身体需求，但是艾德温没有经验，而且艾米莉的母亲除了教育她不要拒绝丈夫的任何要求，并在床边放一小瓶冷霜之外，没有过任何其他的指导。”(第56页)

观臆想的。在她1893年出版的自传里，安妮·伯桑特(Annie Besant)，作为基督教仪式研究者、怀疑论者、无神论者、性观念的激进者、法律改革家、社会主义者，后期变为的神智论者，以她经验丰富的事实评论员的洞察力描述了诸多事实。她这本书部分地吸取了她尖锐的控诉，在书中她直言不讳地谴责了她周围的人缺少坦率的精神。在1866年夏天，她和一名牧师订婚，但是对他了解得很少，而且把他理想化得接近完美。这对情侣一起散步，开车游玩，但是除了这些几乎不做什么别的事情，而且就在这不太坚实的基础上她接受了他；但是她很快就悔悟了，可她母亲不让她废除这神圣的婚约，所以在1867年冬天安妮·伯桑特结婚了。“对于婚姻关系的观念，在我20岁的时候并不比4岁时候知道得多。”她又补充道，“我理想的生活不允许有邪恶的思想进入，在理想生活里我被保护着，不会遭受任何痛苦，没有任何烦恼，对于性的问题都很天真，对婚姻的现实没有任何准备，所以面对这残酷的觉醒，我感到非常无助。”¹

25年后，当她再次重新思考她当时所处的困境时，她审慎地总结道：“在一个女孩成长为成年女性的阶段，如果不告诉她生活中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然后就让她在远离所有的生活群体、往昔的帮助、熟悉的母亲胸怀庇护的情况下，第一次面对这些责任和义务，是最致命的错误。”如果“理想的纯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财富，那么她知道那也是“危险的”财富。她极力主张：“夏娃在离开母爱的天堂之前，应该对善良和邪恶有所了解。”她很快从自己的经历概括出：“许多不幸福的婚姻可以追溯到最开始，追溯到对一个女孩敏感的谦逊和自尊的可怕打击，追溯到她无助的彷徨和恐惧。”对于在学校或者是生活中接受过良好的性教育的人们来说，他们很难想像，“许多女孩会缺少这样基本的性知识”，但是她确保她的读者相信这种现象的存在，尽管这种现象精确的发生频率仍然不能确定：“这种无知至少发生在一些女孩身上，不应该有母亲让她的女儿盲目地、错误地把自己的脖子放到了婚姻枷锁之下。”安妮·伯桑特在6年之内逃离那个枷锁；她特有冒险精神，而且能够勇敢地面对遭人唾弃的结果，因此她在1873年

¹ *An Autobiography* (1893), p.70.

结束了婚姻。但是她警告其他女性,如果不像她这样英勇,不这样反叛的话,她们一生都要受到婚姻枷锁的束缚,成为虚假的优雅和不当的羞耻感的牺牲品,她们重新恢复性感生命力的所有希望都将破灭。¹

实际上,埃菲·罗斯金(Effie Ruskin)的故事——或者更准确地应该叫做埃菲·格雷(Effie Gray)的故事,在讨论19世纪性方面的书籍中经常被引用。简言之,这个故事暗示:健康的性欲能够胜过最优雅的天真无邪,也能挺过罪恶的疏忽。在1854年3月6日,埃菲·罗斯金在一封详尽但简单明了的信中,向她父母诉说道,她结婚长达6年之久,但是一直没有进行过性生活:“我根本不认为我是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妻子——我恳求你们帮助我摆脱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不真实的境遇。”她回忆她和她这个聪明但是古怪的丈夫生活的情景,包括他几天连续不断地讨论性交,但是没有任何要进行性交的想法。“他说明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想要孩子、宗教信仰、想要保持我的美丽,但是在最后这一年,他终于告诉了我真正的原因(而且这个理由对我来说,和其他余下的理由一样可恶),他对女人的想像和他所看到的我完全不一样,而且他没让我成为他妻子的原因是他讨厌我的身体,在第一个晚上,也就是4月10日”,即1848年的4月10日——他们的新婚之夜。²她和她丈夫最后的婚姻破裂对她影响很大,“心理和身体上都是荒废的、焦虑的”,但是在她近似真实而清醒的回忆中,她从没责备她的父母没有在她步入性生活之前为她作好准备,而使她在约翰·罗斯金的诡计面前表现得十分脆弱。所有她说的一切——几乎是顺便说的,就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结婚以后夫妻间彼此的责任,以及作为人世间最亲密结合的婚姻中两人之间的关系。”³她爱她的父母,尽管她聪明而且充满自信,不想反叛或者是怀恨别人。她的经历揭示了关于

¹ An Autobiography (1893), p.71.

² 埃菲·格雷(她在这里故意这样签名,尽管在法律上她当然仍旧是约翰·罗斯金的妻子)写给她的父亲,Mary Lutyens, *Millais and the Ruskins* (1967), pp.155-156。起初玛丽·鲁琴斯和其他详细叙述这个几乎不可能抗拒的事情的人,认为罗斯金是厌恶他妻子的阴毛,对此,鲁琴斯写道,“他没有任何准备”(p. 156n)。但是她不确定,后期作了更改,参见The Ruskins and the Grays (1972), p.108n,在那里他写到在牛津,罗斯金有“机会看到裸体照片”,照片揭示了关于成年女性身体的所有事实。

³ Lutyens, *Millais and the Ruskins*, p.155。——在著名的美国性改革者和生育控制者,玛丽亚·斯托普斯(Maria Stopes)的身上也发生过非常相似的事情,她发现在他们结婚几个月之后,她的丈夫没能完成第一次性交行为。Keith Briant, *Maria Stopes: A Biography* (1962), pp.66-77.

繁荣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诸多方面，她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但她并不憎恨，至少并没公开地表示憎恨，她父母带给她的无知。她的经历也充分地说明她潜在的强烈激情，期待着被唤醒，最后她意识到她的情况是“不正常的”；在经历了艰难而屈辱的离婚过程之后，她嫁给了画家约翰·米莱斯 (John Millais)，拥有了一段持久的婚姻，尽管有时会有暴风雨出现，但总体上是令人满意的，而且他们生了八个孩子。

就像艾米莉·里顿和安妮·伯桑特通过她们痛苦的经历发现的一样，对于幸福的婚姻而言，无知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充足的准备。但这不是最致命的。就像莫莉·休斯 (Mollie Hughes) 在她著名的自传中回忆的，当她在 19 世纪 80 年代订婚的时候，她母亲对她说的话，“偶然有一天，当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她在写信，而我忙着学习拉丁语，‘我想你也意识到了，你将不得不和亚瑟睡觉？’‘哦，是的。’我回答道，带着感激的笑容，我听到所有其他她对幸福婚姻生活的评论都带着同样的笑容。我认为现在她一定是感到很困惑，因为她不知道对这种事情了解多少，或者完全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知道些什么，因为她母亲“再也没有深入探究”，而且莫莉·休斯也没告诉我们。¹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种事情无论她知道多少，都不是在家里学到的。

这里有一些零散的证据，证明法国人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回顾一下古斯塔夫·德洛兹 (Gustave Droz) 的情况吧，他似乎对 19 世纪中期法国资产阶级的婚姻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建构。他提到了一件事，一位新娘的母亲在女儿婚礼后，向她女儿耳语的很少的几句话——显然是对一个忸怩的无知者说的话，但她母亲关于“献身”和“义务”的教导都来得太晚了，而且这时候的教导也是全然无用的。在几年前，也就是 1843 年，乔治·桑给她同母异父的兄弟希波莱特·夏狄龙 (Hippolyte Chatiron) 写了一封说教的信，这封信充满了感情色彩，她希望这封信可以及时地给他带来帮助。她刚刚得知她的一个朋友在分娩时去世了，这个消息让她回想起男性的婚姻行为。夏狄龙的女儿即将结婚，她认为这是对他女儿未来的丈夫说几

1 M. Vivian Hughes, *A London Girl of the Eighties* (1936), p.303.

句话的最好时机：“劝你的女婿在新婚之夜不要粗暴地对待你的女儿，因为除了男人之外，没有别的任何原因能给那些脆弱的女人带来身体器官的伤害和分娩的疼痛。男人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她建议他告诉那个年轻人，要好好地“控制他的欲望，而且要等到他一点点地让他的妻子明白这件事，并能作出反应为止。没有什么可以像这种可怕的行为，这痛苦的遭遇，和一个可怜的、什么也不懂的孩子一样发现，她自己仿佛被一个粗暴的男人强奸而产生的憎恶情绪更令人毛骨悚然。我们要教育她们”，她更加严厉地补充道，“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教育她们，像圣人一样，然后我们把她们培养得像活泼的小姑娘。如果你的女婿是个聪明人，如果他真的爱你的女儿，他会知道他的正确角色，而且如果你在新婚的前一夜和他谈论这些，他也不会产生反感”。¹她说，这就是说教的最终目的。显然，她在教育她同母异父的兄弟方面表现得有点主动，但是她也是迫使自己让她的经验得以表达。乔治·桑，被那些文雅的人看做臭名昭著的思想开放的女性，她更换情人就像其他女人更换衣服一样，看起来她对婚姻的思想准备比埃菲·罗斯金要充分得多，而且她通过切身体验，有时是痛苦的实验，发现了性爱的乐趣。乔治·桑和其他女人的例子都证明了：无知是一种可以疗救的状态。

在这个资产阶级世纪，不仅仅完全没有这种通向男女性爱幸福的线路图；整个感官的世界还都被一种微妙的氛围所笼罩。有教养的女性结婚之后，只有等待她的姐姐为她传授节育的秘密；受传统约束的母亲在传授女儿月经方面的知识时，使用了很多委婉的词语，她这样传授的知识要比本来纯粹的一无所知更有伤害性。纳塔列·巴尔尼 (Natalie Barney)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她是国际知名美女，也是众所周知的女同性恋，1886年她就是这样了解到她即将到来的月经的概念：她母亲指着水族馆里“正在排着红色鱼卵的鱼告诉她：‘你再大一点也会像它一样。到时，你不用感到太惊讶’”。12岁那年纳塔列·巴尔尼第一次经历了月经，她没有惊讶，但却是

¹ [Mid-February 1843] , George Sand, *Correspondance*, ed. Georges Lubin, vol. VI, 1843-June 1845 (1969), p.43.

震惊：她晕过去了。¹几年后，海伦·肯尼迪 (Helen P. Kennedy) 医生对 125 名已经经历了月经的美国高中女学生作了调查，调查她们“是否在这方面得到过母亲的指导，或者是否和母亲自然地聊过这方面的事情”。在这些被调查的学生中，有 36 人根本没和母亲谈过此事；39 人讨论过这件事，但是交谈的方式很不自然；50 人以完全坦诚的方式讨论过这件事。肯尼迪发现这些结果很令人失望：“能够自然地和她们的母亲谈论这件最重要的事情的女生还不到一半！这种无知几乎是罪恶的”，她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无知，是最无知的母亲留给她们女儿的无知”。²这是一名改革者痛苦地呼吁的声音。我们下面还会遇到这种情况。

还有其他具有同样影响的片段，但是女人总是其中的受害者。的确，卧室里的粗暴行为，好色的丈夫强暴蜷缩着的一无所知的新娘，成为资产阶级自我批评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场景，特别是在 19 世纪末的时候，也就是从维多利亚时代过渡到弗洛伊德时代的这一段时间。这就导致了情景剧中两个人之间的似是而非的场景——胆小害怕的女孩不情愿地离开母亲的怀抱，被无助地扔到这个陌生人的面前，这个陌生人也就是她的丈夫。现在，那个心情急切的男人，欲望横溢，迫不及待地要享受肉体的快感。由于受传统的束缚，他已经被迫把他的行动推迟到现在，所以他必然要抛开绅士风度，最后不受任何束缚地要履行他的“婚姻权利”，他漠视了他这个脆弱的战利品，不管她经受的身体上的疼痛和心灵上的折磨。这就能很明显地看出为什么许多女人都经受讨厌而且恐怖的病态的折磨。玛丽·伍德-艾伦 (Mary Wood-Allen) 医生在她简明扼要的著作《理想的婚姻生活》(*Ideal Married Life*) 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在我的患者中有一位女孩，自从新婚当晚就患上了阴道痉挛，当时这位新娘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由于巨大的恐惧退缩了。不管什么时候她的丈夫接近她，她的阴道就不自觉地痉挛紧闭起来。”斯卡德·普劳佐勒斯 (Sicard de Plauzoles) 医生，一名法国女权主义者，雄辩地呼吁赋予女人安排自己身体的权利——特别强调包括她

1 Jean Chalon, *Portrait of a Seductress: The World of Natalie Barney* (1976; tr. Carol Barko, 1979), p.7.

2 Dr. Helen P. Kennedy, “Effect of High School Work upon Girls During Adolescence,” *Pedagogical Seminary*, III (June 1896), pp.469-482.

们“接受或者拒绝性行为，和怀孕”的权利——同时也形象化地用比喻的形式再现了婚内强奸：“丈夫把力量残暴地释放在妻子身上的行为，是对每个拥有自由思想和绅士情感的男人良心的反叛。”¹

这个比喻既是悲观的，又带有寻衅性，强烈地暗示了婚姻的开始是一种不利于幸福而又冷酷无情的行为，这个比喻被倡导性改革的专家们所认同。即使是在无可怀疑的保守的文章中，尽管所使用的词汇更温和一些，但是也具有同样的暗示。在新婚之夜，合法的强奸看起来是一种流行病。288 这些宣传小册子也谈到了新娘在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献出自己的身体”，对她进行的“必要的折磨”，也经常谈到她的“屈服投降”。1850年，英国社会活动家W. R. 格莱戈 (W. R. Greg) 写了一篇备受争议的关于卖淫的报道；在文章中他坦率地指出无论结婚与否，“有礼貌有教养的”年轻女性发现，“自己第一次献出身体，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的，都处在一种爱和羞耻混合的精神极度兴奋的状态下”。²

我不怀疑有这样的家庭悲剧发生，而且这种悲剧也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在这些插曲中，有很多只是虚幻臆想，但也有同样的社会现实，也许还会更多。无论这些现象在过去或现在，或在多大程度上被看成一个现实，它们只不过是男人焦急欲望的体现：他们要坚持自己绝对的掌控，还有一些女人也屈服于男主人的皮鞭之下，从而使得这种欲望更加猖獗。我们知道，19世纪的新郎毕竟总是很有耐心，行为很得体的。我已经引用过莫霞医生采访过的那些女性的丈夫作例子，他们中一些人延迟了所有的尝试，把完婚向后推迟了三天，甚至一年的时间。而且，年轻的小伙子在这方面拥有的知识，并不比他们娶的处女多。安妮·伯桑特指出的情况确实很真实，青春期的男性获得性体验的机会要比青春期的女性多得多；对男人和女人的要求标准截然不同，它鼓励年轻男子积累这方面的经验，而他未来的妻子就要顺从地等待着从他那里获得知识，这样的双重标准让我们理

¹ *Ideal Married Life* (1901), p.155; de Plauzoles, *La Fonction sexuelle. Au point de vue de l'éthique et de l'hygiène sociales* (1908), p.344, 347.

² [W. R. Greg], “Prostitution”, *The Westminster Review*, LIII (July 1850), p.473.

解,或者至少是怂恿了,一些表面上明白无误的性行为。¹同时,年轻男子也接受并承载了错误的信息,或者有的男子看了女人一眼,就觉得她和他们的母亲一样不可碰触——至少在他们的意识里是如此,所以他们就放弃了这样严肃的实验。

一如既往的情况是,性教育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看起来似乎要更好一些。劳伦斯·琼斯爵士(Sir Lawrence Jones)回忆起他在牛津度过的那段战前的日子,“那个年代,我们有很强的好奇心,那时欧洲大陆的年轻人是研究男女关系的专家”。1905年左右这些牛津大学学生们的生活大部分是“完全没有女性的”。劳伦斯承认他和他的朋友们“成天做着白日梦;我有我自己痛楚的幻想”,但是“漂亮的女孩子被完美地理想化而完全不可接触,而相貌平平的女孩子则非常可怜被搁浅在他们的需求之外,而且由于虚构出的男女之间的鸿沟使得双方都很难把彼此看做是同等的生物体”。不可避免的是,他们和女孩子之间的交往是“正式的、矫饰的,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聊天涉及的内容也很有限”。当劳伦斯爵士和他的朋友们鼓起勇气询问有关性方面的问题时,他们接受到的只是当时流行的文化信仰的教育,甚至是专家为他们提供的这方面的教育。他回想起这些大学生和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医生一起共进的晚餐;当他其中的一个朋友问到“女人是否喜欢性交”时,那个医生告诉这些参加聚会的年轻大学生说,“作为一名医生,‘我可以告诉你们,十个女人当中有九个是性冷淡,或者主观上是不喜欢的;第十个,可能喜欢性交,但通常是个妓女’”。时隔多年,劳伦斯爵士再次回顾这位医生的判断,认为这话太武断,完全混淆是非,甚至是有害的:“如此权威的论断,我们把它当成真理。很难想像有比这更坑害年轻人的信息了”,因为它“既谴责了所有热情的新郎,又诽谤了所有自愿的新娘”。他补充说,那个医生“也许是最善良的,也是最诚实的,但是由于受传统的束缚,女性都变得虚假的害羞……从而使得这名医生变得如此的无知”。²这是一种可怜的辩解,而不是一种诊断;对于女性患者在医生诊室里害羞的虚假表现,大部分医生感觉都是非常舒适,而且如果他们的

1 另一方面,“纯洁的文献”总是坚持男人和女人在结婚之前一样纯洁无瑕。

2 L. E. Jones, *An Edwardian Youth* (1956), pp.162, 37, 163.